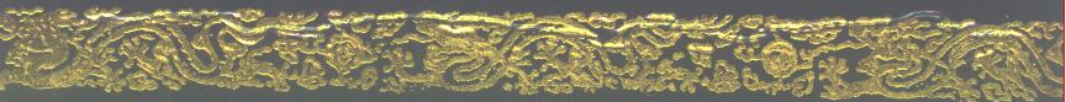


清代 全史

第七卷

清史研究丛书
辽宁人民出版社



清代全史

第七卷

本卷主编 龙盛运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1号

清代全史

·第七卷·

Qingdai Quanshi

本卷主编 龙盛运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26,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8 插页: 5

印数: 1—1,553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虹

责任校对: 吴广君

封面设计: 赵多良

版式设计: 赵耀今

ISBN 7-205-02341-6/K·264

定价: 14.00元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研究经费，由辽宁人民出版社资助出版。

本 卷 主 编 龙盛运

本卷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龙盛运 朱东安

李长莉 茅海建

姜 涛 夏春涛

前 言

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早在60年代初便酝酿组织全国力量，编写一部大型清史。由于十年动乱被迫中止。十年动乱结束不久，这项工作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但由于前辈学者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年迈体弱，这项工作便落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在完成前辈未竟之业。

1983年以前，曾设想组织全国各省市科研机关和高等院校的力量，编写一部1000万字左右的清史，并按这个设想拟定了规划。经过反复讨论，鉴于大量的清史资料特别是清代档案正在整理，专题研究还不够深入，修纂大型清史的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规划一时难以实现。

1983年在长沙史学规划会议上，重新讨论了清史规划。这个规划的要点是，自1983年起到1990年，即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以8年的时间，完成一部10卷本的《清代全史》（当时暂名为《清代通史》）和大约20卷的《清代人物传稿》。

这部《清代全史》是纳入全国史学发展规划的项目，由国家资助研究经费。书中的观点，是我们探索性的学术见解。编撰人员完全是自愿结合。项目负责人邀请一些朋友，分别担任各卷主编，再由各卷主编聘请学术界同仁组成该卷的编写小组。第一卷主编李洵、薛虹，第二卷主编王戎笙，第三卷主编郭松义，第四卷主编王戎笙，第五卷主编韦庆远、叶显恩，第六卷主编喻松青、张小林，第七卷主编龙盛运，第八卷主编宓

汝成，第九卷主编徐彻、董守义，第十卷主编刘克祥。

本书不设总主编，采取分卷主编负责制。这是一个尝试。目的在于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有利于发挥撰稿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可以心情舒畅地一道工作。为保证本书具有较高学术水平，我们经常举行分卷主编会议，除了讨论工作中的问题外，主要是讨论重要学术问题。例如，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以及清政府应付这种新形势的能力，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边疆地区的开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特征，这些问题在分卷主编会议上都交换过意见。我们的写作过程，是互相学习、互相砥砺的过程，也是全书在重大理论上保持完整体系的过程。

我们的目标是编撰一部反映现阶段我国清史研究水平的学术专著。因此，我们力求放眼世界，注意信息，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吸取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如积薪”，我们力争有所前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得到许多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海外同行们以各种形式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以出版《清史研究丛书》享有盛誉的辽宁人民出版社热心地接受本书的出版，并慷慨地给予出版资助。该社的袁阔琨编审、徐彻副编审、高虹编辑，为这部书的出版尽了很大的努力。对此，我们由衷地感谢。我们学识有限，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不吝指教。

王戎笙

1990年7月

目 录

前 言

绪 论	1
-----	---

第一章 两次鸦片战争	13
------------	----

第一节 战前中英关系	14
------------	----

第二节 鸦片战争	29
----------	----

第三节 五口通商	50
----------	----

第四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	76
-------------	----

第五节 沙俄侵华	104
----------	-----

第二章 太平天国与各地各族反清起义	125
-------------------	-----

第一节 底层社会动荡的加剧	125
---------------	-----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兴起	134
-------------	-----

第三节 定鼎南京	162
----------	-----

第四节 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	188
-----------------	-----

第五节 太平天国的败亡与反清斗争余波	202
--------------------	-----

第三章 咸丰朝的危局和湘淮军集团的崛起	236
---------------------	-----

第一节 咸丰帝挽救内战危局的努力	236
------------------	-----

第二节 湘军的组建	260
-----------	-----

第三节 湘军集团的壮大	279
-------------	-----

第四节 淮军集团的兴起	299
-------------	-----

第四章 同治朝的内政与外交	308
---------------	-----

第一节	垂帘听政制度的确立·····	308
第二节	地方分权的增强 社会秩序的维持·····	338
第三节	对外新格局的滥觞·····	366
第五章	道咸同三朝的思想和文化·····	401
第一节	思想和文化剧变的开始·····	401
第二节	太平天国的文化与思想·····	420
第三节	新思潮的兴起与新文化事业的出现·····	438
后 记	·····	461

绪 论

本卷是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三年（1840—1874年）的政治史。这35年，中国不仅遭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的侵略，爆发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高潮；而且，发生了空前的巨变，清王朝从此进入苟延残喘的晚期，持续约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也由此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人类在很长时期内，虽然在全球形成了许多民族文化和国家，但除了地区内有较多的，甚至密切的联系外，各个地区之间，就一直很少，甚至几乎没有交流往来，从而形成相当稳定的地区性封闭状态。中国所在的东亚，与英法等国所在的欧洲，就是如此。但欧洲各国并立，互争雄长，中国则自古以来，既是东亚唯一大国，又为东亚文化中心。这使中国统治者长期在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自我陶醉，养成闭目塞听，睥睨一切的习惯。随着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进行，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各个地区封闭状态就先后被打破，处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和国家，几乎都被纳入西欧资产阶级所主宰的世界秩序中。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一大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具有一切剥削制度的共性，而其对外侵略性掠夺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其早期，这后一方面，更以十分野蛮的方式进行。事实上，15世纪以来，欧洲以外几乎所有国家

民族，都遭到了他们的侵略抢劫，乃至屠杀，或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几乎被消灭。中国作为庞大的帝国，有光辉强大的过去，至清代仍有把荷兰赶出台湾，击退沙俄入侵的纪录。这使西方各国长期不敢公然入侵。乾隆末期，作为经济最发达，军事最强大，又在印度站稳脚跟的英国，开始成为西方各国入侵中国的急先锋，先图通过外交途径，牟取殖民和商业利益；后改用鸦片走私悄悄侵入的办法。至道光朝，随着工业革命的胜利和完成，英国统治者不再满足规模愈来愈大的鸦片走私，在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之后，又掀起强行打开中国门户的浪潮。

与突飞猛进，并蓄意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形成尖锐对比，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仍然是封建社会，经济上是以小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政治上封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清王朝最大的特点是保证满族贵族在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中的主导地位，并为此而采取许多具体制度和措施；同时，为加强其对汉族为主体其他各民族的统治，又在诸如文化和对外关系方面进行更为严格的控制，从而使中国处于更加闭塞的状态。这一切措施，虽使清王朝的统治得到加强，并取得一系列成就，但各种弊端和矛盾也在日积月累，以致乾隆末期，总危机就已初露端倪，爆发了三省白莲教和苗民大起义。此后，特别是进入道光朝，在鸦片大规模走私带来一系列后果作用下，社会更趋动荡，吏、财、军诸政积弊积弱更加深重。总之，清王朝已由盛转衰，开始进入历代封建王朝末期常见的危机之中。道光帝为首的满汉统治者对此虽缺乏认识，但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感觉。正因为如此，目睹鸦片泛滥的恶果，耳闻严禁论者有说服力的分析和警告，道

光帝就不能不悚然难安，并一反老年遇事苟安的作风，断然下令严厉禁烟。

这就是说，清廷宣布禁烟时，不仅国势已日益衰弱，危机深重；且只根据国内需要决策，对国际形势的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既不知鸦片走私，在英、印、中三角贸易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更无正确的对策。这种情况使中国首先在战备方面，不仅武器装备大大落后于英国，且除了林则徐在广州有所部署外，全国，甚至沿海均无有效的防卫措施；其次，在战争过程中，清军积弊积弱暴露无遗，累战累败；最后，在总方针方面，清廷又忽“抚”忽战。既要征调军队赴战，又担心军费开支，加重国库窘境。既不甘心丧权辱国，决心一战，又怕外战引发内乱，不敢抗战到底。这样只能在再战大败之后，迅速屈膝求和了事。

但是，并未因此而惊醒的清政府，仍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拒不了解世界大事，拒不学习近代外交，以致战后十余年中，一直把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当做永杜西方侵略的“万年和约”。当英、法、美、俄先后以“修约”和战争相加时，清政府在上次战争中所表现的愚昧、昏庸和怯弱，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再次表现出来，从而给中华民族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

二

道光时清朝总危机的加剧，不仅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也是促使革命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而总危机能否克服，或部分克服，又是满汉统治者能否赢得内战，乃至彼此权力升降的关键。

乾隆末年就已初露端倪的总危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剥削和压迫的日益沉重，使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日益尖锐；二是行之已久，体现中央集权制度的各项法规，或变为具文，或弊端百出；三是军政官吏，特别是大贵族大官僚日益腐败，遇事苟且敷衍，贪赃枉法，加重了官府对农民的压迫剥削，甚至许多中小地主也不能幸免。以后这三个方面不仅继续恶化，至道光时，又添上鸦片走私，天灾频仍。前者因造成白银大量外流，银根紧缺，银贵钱贱，而使市场萎缩，纳税人负担大增；再加上官吏兵弁吸食，走私贿赂，就使二、三两项变本加厉。后者使各省，特别是长江两岸哀鸿遍野。总之，道光时，不仅经济停滞，甚至倒退，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激化，中小地主不满情绪加剧。同时，军、财、吏诸政的积弊积弱也愈来愈严重，国库入不敷出，军队战斗力低下，政府职能削弱等情况有了恶性发展。结果，就既无能力防御外敌入侵，又不能保持国内稳定。鸦片战争的惨败，既是这种总危机的必然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总危机。历史证明，以往封建王朝，一旦出现类似的总危机，当权的统治者就不可能自行解决；而处于社会最低层的农民阶级，却因为是总危机的最大受害者，而成为引爆总危机的原动力。部分中小地主，也因不堪日益加重的赋税负担，乃至贪官污吏的压迫勒索而加入斗争。

事实上，鸦片战争前，特别是战后，各省的闹漕、阻考、抗租、饥民、灾民、乃至武装起义等类斗争，就风起云涌，其中江南各省尤为众多。农民是斗争的主力军，许多中小地主不仅是前两项斗争积极参加者组织者，有的还卷入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其他斗争，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秘密活动已久，遍布长江以南的天地会，虽不能把斗争推向高潮，但其所造成的巨大声势，却推动了洪秀全，掩护了上帝教。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及其以后数年，虽没有明显的反清革命意图，但其由热衷科举考试，到绝意科场，甚至摒弃孔子牌位的转变，却透露出他的不满和疑惑。正因为如此，当他再入广西目睹耳闻天地会巨大的反清能量，并与真诚信仰他的教众朝夕相处之后，才能迅速理解广大群众的不满，并把他个人的不满与之结合起来，升华到反清革命的高度。思想上有了这样质的转变，洪秀全方能运用基督教知识，儒家大同传说，天地会反满等思想资料，并总结实践经验，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和《奉天讨胡檄》等文献，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教义和仪式，制订了以圣库制度为核心的各种条令。这就使太平军起义后，连获大胜，二年多就能建都天京，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从而把传统农民战争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获得这样巨大的胜利，除了上述主观原因外，客观上还由于清王朝统治存在严重的总危机。社会矛盾的普遍激化，就使太平军获得天地会、捻军、白莲教系统以及汉、苗、回、壮、瑶等族人民群众，广泛的支持和响应，得以迅速壮大；清政府则处于顾此失彼，应接不暇的困境之中。军、财、吏诸政的积弊积弱，又使前线清军和各级政府抵抗力大为削弱，有的甚至不战自溃，望风瓦解。更为严重的是，清廷虽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但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应急之方，没有触及导致总危机日益严重的病根。如绿营腐败，战斗力低下，不仅与贵族官僚日益腐败，更与行之已久、积弊日深的各项绿营制度有着因果关系。咸丰帝即位后，虽不断告诫大小官僚要革除腐败习气。但前期一直未采取有力措施，以致言之谆谆，听之藐

藐。对于行之已久的各项制度，又囿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积习，更不愿加以触及。这样就既不能改造绿营，更不愿组建与绿营完全不同的新军，只能大量招募依附于绿营的勇营。主军已腐败不可救药，附之者自然难逃近墨者黑的规律。

清廷中央不仅从根本上说已处于挽救无术的困境，而且，三年二月，户部就已无款支付军饷，绿营能续调的兵也为数不多。这样各省，特别是处于前线的军政大员，也就不再墨守成规，纷纷自行筹备战守，或截留地丁漕根，或创立新税，或委派将领募勇，然后一奏了之。而无兵无饷的清廷，也无法再坚持中央集权制度各项法规，只好允许或默认大吏的越权行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团练大臣曾国藩为首的湖南地主士绅，在咸丰三年组建了湘军，并取得了肃清两湖的巨大胜利。湘军取得成功，除了湖南的特殊情况外，最主要的是曾国藩等人既对绿营种种腐败深恶痛绝，更认识到积弊已深的绿营制度，非彻底加以改革不可；因而能建立在制度上与绿营对立，在人事上与绿营割断联系，以中小地主出身的士人为骨干，面目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提高的湘军。这就是说，曾国藩不是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是从总危机两方面，即统治者的腐败，积弊已深的制度法规入手，才能一举成功。

但是，清廷却因湘军是曾国藩一手创建，并为其严密控制，又几乎全是湖南人组成的军队，而抱有严重的戒备心理，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针，从而严重地阻碍了湘军的大发展。有见识的满族贵族不断要求改变这一方针。前期的代表者文庆就请咸丰帝破除满汉藩篱，重用曾国藩和湘军，并使胡林翼得以出任湖北巡抚。后期的代表者肃顺等三人，不仅坚持文庆的主张，还要求对昏庸腐败的官场，甚至对

大贵族大官僚，进行有力的整肃。对军政运转不灵深为焦虑的咸丰帝也因此而愈来愈信任肃顺等人，先在其支持下，惩办休致一批官僚贵族，使腐败的北京官场有所收敛；后更改变限制湘军的方针，使曾国藩等湘军将帅出任督抚。这样，不仅为湘军集团大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使肃顺等人权势日大，终于取代了军机处。

在这之前，咸丰四年至九年这几年中，左宗棠、胡林翼在两湖，沿着组建湘军的思路，趁大权旁落于军政大吏之机，先后惩治、提拔大批官吏，大量引用士人，扩大绅权，整顿改革田赋厘金等税的征收。这就增强了两省官府的行政效率，打击了腐败的风气，扩大了军饷的来源，改善了官府同中小地主的关系，严密了对下层群众的控制，使两省成为湘军既稳定又能提供大量支援的后方基地。与此同时，特别是九年以后数年，随着绿营八旗的不断溃败，从清军主力，降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许多省的军政官吏，或被革命军歼灭，或因失职被罢斥，而湘军则由西线主力，上升为全国清军主力，大批湘军将帅也相继出任督抚。他们又在各自辖区程度不同地仿行两湖作法，对吏、财、军诸政进行整顿，为各自统领的湘军，创造维持和发展的物质条件。这一过程，实质上也是对总危机三个方面，即统治者的腐败，积弊已深的制度和社会矛盾的加剧，进行程度不一的保守治疗和外科手术。结果，自然是大大增强了镇压革命的综合实力。

与地主阶级由弱变强相反，太平天国则出现了由强变弱的趋势。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革命者面临传统农民战争的难题，即建立什么样的政权。《天朝田亩制度》全面展示了他们的方案和理想。但这种以平均主义为指导，背离社会发展进程

的空想，只能束之高阁；而庞大军政经费开支的实际需要，却引导他们去继承清王朝的田赋制度，从而也就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这样，虽然还在继续打击地主，甚至由于他们的斗争，小农土地所有制还有所加强；但总的说来，他们反对地主的斗争不能不遭到削弱，与广大农民也不可能建立持久的血肉联系。金田起义前后逐步形成的二元化领导体制，以及以家族地域为基础的小团体风气，也在建都天京后，演变为洪秀全与杨秀清争夺权力的斗争，韦昌辉又图从中渔利，终于导致天京事变，造成革命队伍分裂，人心涣散。更为严重的是，以后再也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小团体风气也愈演愈烈。洪仁玕虽然提出一系列主张，其中建议在经济上全面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尤为突出，并且得到洪秀全的批准；但他并无军事行政实践经验，所言大多纸上谈兵，《资政新篇》更与当时战争环境脱节，对正趋衰败的革命大局自然无多大补救作用。至于天地会、捻军以及苗、回等反清起义军，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形式不同的宗派主义又使他们彼此，甚至自身也不能结为一体，来进行统一的反清斗争。他们与太平军之间，也只有临时性的军事合作。这使看来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实际上各自为战，从而为清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

西方侵略者对这样全国性，又以长江中下游和江南广大地区为主要战场的大内战，虽然十分注意，但一直未敢直接介入。这是因为不仅斗争双方力量对比很长时间未达到成败判然的程度；更为主要的是双方都对他们存在着距离，他们则对双方抱有或多或少的希望。总之，他们需要时间，观望形势，试探双方态度。于是中立就成了他们最好的策略。通过直接往来，亲自感受了太平革命者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态度后，他们

终于明白与太平天国政府的距离无法缩短，更不能消灭。与之不同，清政府固然担心他们因宗教近似，而支持革命；更害怕他们如以往入侵者那样，取而代之，消灭清王朝。但是，通过在上海帮助镇压小刀会和太平军，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压服，以及战后迅速退出北京，终于打消了清政府的疑虑和敌视。在这个基础上，侵略者又进一步向清政府伸出援助之手，公开抛弃中立，给予清军多种援助，甚至派出海陆军，与清军一起镇压太平军。这就使本已处于劣势的太平天国，加速走向败亡；也使太平天国革命，和后来的其他革命一样，在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而越出传统农民战争的范围。

三

同治时的清政府既取得内战的胜利，又获得中外暂时相安的局面，与道咸纷扰，战火不断，甚至岌岌可危的险状相照，无疑有中兴之势。但是，同治朝的变化既巨大又复杂，远非中兴二字所能概括。

首先，中外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满汉统治阶级中被称为洋务派的当权者，开始抛弃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面向世界，既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又学习办理近代外交。这就使同治朝的对外关系，比道咸两朝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同时，在两次鸦片战争的压服下，随着某些疑虑的消除，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屈从依附心理也滋长了，不仅接受帮助扶植，与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甚至海关大权也乐意交与英国人。对以沉重代价换来的中外暂时“和好”局面，也抱有不实际的幻想，以为只要恪守不平等条约，遇有教案等类争端，尽量屈